

主编 高歧清 副主编 张金城 刘兆伟

# 儒家教育九面觀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儒家教育九面观

主 编 高歧清

副主编 张金城

刘兆伟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沈阳

(辽)新登字第9号

**儒家教育九面观**

主编 高歧清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沈阳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80千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

责任编辑: 李文禄

封面设计: 邹本忠

刘东杰

责任校对: 马立武

---

ISBN 7-5610-2377-4

K·213 定价: 8.00元

## 前 言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儒家思想的作用  
是密切相关的。今天，要找出中国文明史中可贵的借鉴，就一  
定要研究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伦理道德思  
想，当今世界由于种种需要而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者与日俱  
增。

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一直不同程度地  
奉行孔孟治国安民的学说，并深受其益。西方世界近年来由于  
道德危机，人与人之间关系淡漠，社会责任感与群体思想每况  
愈下，造成家庭破裂、亲情削弱，盛言利而寡求义，难以维持  
社会的安定局面。于是西方国家的理论界开始研究在生产高度  
发展了的国家中，人们生活高度现代化，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  
的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其实，西方世界近年来为预防这些  
问题的出现，一直加紧以基督教思想来教化人们趋善去恶，妄  
图以“天堂”诱导人们自我约束，以利社会稳固。可是随着现  
代生产愈加发展，神的权威、“天堂”都失去了它的迷惑力，  
所以当今的西方世界多失去原有的信仰。而其原本又缺乏中国  
式的伦理道德约束。这样，思想、道德危机就严重地威胁着西  
方世界的现实与未来。于是，中国古代的善学和社会各级各  
类矛盾的孔子学说、儒家思想，就不仅在东方盛行，在西方世  
界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以至有的西方国家首脑声称要借鉴中国

的孔子思想来治理国家。此类讲法绝非偶然，有其历史的依据与现实的必需。

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文化教育方面讲，要体现中国特色，就必须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思想。我国一些领导人和一些著名学者对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一直予以充分地肯定。北京大学季羨林教授预言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的重心将要东移，东方将取代西方成为文化中心。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世界上由于民族、宗教等诸多矛盾冲突导致大混乱，反映了人类的心态严重失衡。因此，他强调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更大规模的新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呼唤一个新的孔夫子，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条出路”。这都指出弘扬、借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教育传统是极为重要的大事。

沈阳师范学院近年来在弘扬民族文化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地研究工作，出版了多部有关专著和多篇论文，学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

《儒家教育九面观》一书，由辽宁省人民政府督学、辽宁省高教学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务委员会主任高歧清主编，辽宁省高教学会理事、沈阳师范学院副院长张金城、沈阳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刘兆伟任副主编。全书由主编确定框架、提出著作提纲、组织著作人员，并率先撰文，以为范例。副主编辅助主编落实著作计划、审理稿件以至最终定稿。

全书分为二十八章，参加著作人员：第一章高歧清，第二章高歧清、刘国瑞、乔东升，第三章张金城、白文韬、苏可可，第四章李放、杨福成，第五章刘云翔、刘颖、廉秀君，第六章刘桂云、郎晓东，第七章高凌亭、朱秋云，第八章曾绍元、刘兆伟、高岩，第九章刘兆伟、高岩，第十章高歧清、张家鹏、范智海，第十一章李玉梅、卢素梅，第十二章崔玉平，第十三

章胡传庭、于守海，第十四章王思义，第十五章鲁洪生，第十六章刁晶辉，第十七章夏敏、张家鹏，第十八章赵慧平、关敏，第十九章林群、郭金哲，第二十章张君，第二十一章郭瞻予、赵伟，第二十二章刘少春、赵准明、乔凤英，第二十三章唐仁洪、苏显阳、王喜斌，第二十四章周浩波、任春风，第二十五章郭大光、裴瑾莹、杨钟莉，第二十六章程刚、栗伟，第二十七章张维平、姜丽华、赵宝石，第二十八章张金城、许金龙。

参加本书著作者有院领导、教授、副教授、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讲师、研究生、本科生。涉及人员范围之广，层次之多，是我院前所未有的。各章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儒家文化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观点，本书主编、副主编统而观之，汰其杂芜，撷采精华，集腋成裘，浑然一体。不难看出沈阳师范学院上下左右普遍重视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教育传统。这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将会大有裨益。

本书出版过程中承蒙辽宁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李文禄编审、总编室主任刘东杰副编审的大力支持；书法家董文教授题写书名；研究生马立武为本书的出版作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本书著作时间仓卒，水平有限，诚望读者赐教。

编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于沈阳师范学院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论董仲舒三大文教政策·····        | ( 1 )   |
| 第二章  | 论董仲舒“天人感应”说·····       | ( 12 )  |
| 第三章  | 关于儒家“义利观”的思考·····      | ( 25 )  |
| 第四章  | 儒家人性论与西方人性观之比较·····    | ( 38 )  |
| 第五章  | 儒家乐教与我国今日音乐教育之比较·····  | ( 56 )  |
| 第六章  | 儒家道德与中国人的现代化·····      | ( 71 )  |
| 第七章  | 中国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       | ( 83 )  |
| 第八章  | 论儒家教师观·····            | ( 92 )  |
| 第九章  | 儒家家庭教育思想考论·····        | ( 102 ) |
| 第十章  | 论孔子的“正人必先正己”说·····     | ( 120 ) |
| 第十一章 | 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其于今日之意义····· | ( 131 ) |
| 第十二章 | 论孔子的人才思想·····          | ( 141 ) |
| 第十三章 | 浅谈孔子的“有教无类”·····       | ( 148 ) |
| 第十四章 | 略论孔子的圣人境界观·····        | ( 162 ) |
| 第十五章 | 孔子仁学及其理想人格·····        | ( 177 ) |
| 第十六章 | 孔子·雷锋·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选择····· | ( 196 ) |
| 第十七章 | 孔子与王守仁教育思想比较·····      | ( 207 ) |
| 第十八章 |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艺思想·····       | ( 216 ) |
| 第十九章 | 孔子教学方法简论·····          | ( 230 ) |
| 第二十章 | 评孔子“学而优则仕”·····        | ( 242 ) |

|       |                               |         |
|-------|-------------------------------|---------|
| 第二十一章 | 孔子对教学心理学的运用·····              | ( 251 ) |
| 第二十二章 | 论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           | ( 262 ) |
| 第二十三章 | 论孟子的“存心养性”说·····              | ( 271 ) |
| 第二十四章 | 孟子“存心养性”说及其对人<br>修养的几点启示····· | ( 282 ) |
| 第二十五章 | 孟子“持其志，无暴其气”之<br>真谛与继承·····   | ( 288 ) |
| 第二十六章 | 荀子的“尚贤使能”思想及<br>其现实意义·····    | ( 300 ) |
| 第二十七章 | 由“藏息相辅”原则看儒家的<br>“乐学”教育·····  | ( 308 ) |
| 第二十八章 | 理学及其道德教育思想探析·····             | ( 322 ) |

### 儒学研究文存

|                                      |     |         |
|--------------------------------------|-----|---------|
| 关于孔子的言语教育思想·····                     | 马秋帆 | ( 332 ) |
| 儒学散论·····                            | 齐红深 | ( 336 ) |
| 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阳春白雪”<br>——评《孔子》电视剧····· | 刘兆伟 | ( 349 ) |
| 孔子是我国第一位图书分类学家·····                  | 潘德利 | ( 360 ) |

## 第一章 论董仲舒三大文教政策

董仲舒是西汉王朝的思想家、政治家、儒学大师和教育家。他立足于维护封建制度的巩固与发展，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化民成俗，以教化为“堤防”，去制止人们的私欲膨胀。为此，他主张设太学以养士，选士贡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全国上下大兴教化之风。这三大文教政策的提出促使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教育。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教育制度，开创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以儒家教育思想为正统的教育局面。

这三大文教政策为什么会产生？以及它的施行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力？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为我们读史的目的旨在鉴今，这当然是应该思考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析问题应抓住其主要方面，而在这三大文教政策之中，“养士”与“选士”只是两种具体的文教措施，“独尊儒术”作为贯穿其始终的主导思想，是三大文教政策的主导方面。由于“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儒家思想成了封建社会的教育内容，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封建史上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

### 一、“独尊儒术”的教化思想

儒学的发展经历了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汉朝的“独尊儒

术”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后，便一直为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所尊奉，长达两千多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代史学家多认为这一政策的实行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所谓一个是为了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其实，这一文教政策的产生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决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倡而成的，这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如政治、经济、哲学等情况所造成的必然趋势。众所周知，政治、经济、是教育的基础，对教育的性质、职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哲学、政治观点是教育的指导思想或理论根据；而教育又为政治、经济服务。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政治、法律、哲学、教育、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sup>①</sup>。这一科学理论，指导我们能够切实地理解汉王朝采纳儒学为统治思想是为其政治经济所制约，及其以儒学作为政治、教育的精神支柱的道理。

纵观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董仲舒的社会活动正当西汉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也就是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取得了初步的“治平”成就而要求发展之际。然而就在这种治国兴邦的昌盛前进的形势中，潜存着“土崩瓦解”，即人民反抗封建压榨与地主阶级内部争乱的危机。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对维护和强化封建秩序来说，就要求加强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统治。再从当时的统治思想情况来看，西汉初期的政治指导思想——黄老学说实际上也未能成为当时真正的坚实的统治思想。这主要是由于西汉统治者在统治思想上并不一致，导致各家学者代表封建统治者不同集团和阶层的利益为争取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而互相论战。西汉当时的朝野间，各倡其说，展开了百家争鸣。及至武帝，随着董仲舒提出的三太文教政策的实现，这种局面才趋于平静。董仲舒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总结

汉王朝建国以来的治国经验，指出当时思想纷争的情况及其危害，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sup>②</sup>。而汉武帝为振兴封建帝国大业，就要求“永维万事之统……欲闻大道之要”。这也就是提出要建立一个好的能以加强封建皇权统一天下的政治指导思想。十分明显，要实现汉帝国的大一统，必然有思想学术的统一。

“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施行，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汉武帝为何采用儒家学说，而不采用其他学说作为其统治思想呢？这决不是董仲舒单纯劝说的结果；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汉初以来，诸多儒者不断宣扬“偃武修文”行仁义以治世的学说，并与其他各家进行多方争辩以阐明儒学对于维护封建秩序的优越性，这种不断的宣传和斗争促使儒学本身进行调整，以便更加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而董仲舒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为汉武帝选择了这种思想。他对汉武帝强调指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得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要求实行“更化”以得“善治”是董仲舒的主要政治思想。必须知道，他所谓的“更化”与“善治”绝非改变封建制度，乃是排除黄老与申商学说，亦即反对道家、法家思想为治世之方，要改用儒学为治世之道，从而使汉天下能够长治久安。他的独尊儒术的要义和根本内容，即是以儒家的仁义礼乐之道为统帅，实行儒家所主张的维护封建秩序的德政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导之以德”的德教。

关于“德政”，董仲舒是以“天之任德不任刑”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的。此中“德”表达着“天意”的思想，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他抛弃了先秦儒家某些非宗教性的优良传统思想，而播起了神幡，把儒学加以神学化，使人“奉天”而遵“天意”。然而董仲舒在政治上主张“任德”这在封建统治下虽然难以切实实现，具有一定的空想性甚至起着欺骗作用，但是比起只有“任刑”的虐政来，还是有着开明

的进步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并非完全主张只是“任德”而摒弃刑罚。他是要求“先德而后刑”的。这体现着儒家传统的“礼乐刑政”的主张，贯彻着刑礼结合，实行“德主刑辅”的精神，他吸收法家的思想，以德的矛盾对立面“刑”作为补充，使他的治国方针体现着辩证法的光辉。由此我们可认识到，董仲舒独尊儒术，是吸取其他学说中有助于王道之治的成分，加以揉合，纳法于儒。这表现着某种意义的兼容并包，体现着独尊儒术下的一些包容性及一定的开放性，而不是对其他学说不加分析地一味排斥，正是由于这样，才能使儒学不断丰富与发展。

关于“德教”问题，董仲舒作为汉代具有卓见的政治家和教育家而非一般的传经授业的儒家，他首先着眼于教育作为国家的精神统治工具的意义，特别强调教育对于维护封建秩序和巩固汉王朝“长久安宁数百岁”的巨大作用。实施“德教”是可以教化和统摄人们的思想及“得民心”的。他认为汉王朝建立以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于民，“废德教而任刑罚”这就必将使得“邪气积于下，怨恶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因此宣称：“刑者不可任以治也。”他主张为君学政者应该“布德施仁以厚之，设教立礼以导之”，遂向武帝陈述说：“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从而指出“是故南面而政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董仲舒如此重视教化，表达了教育与政治密切关系的一条规律，说明了教育的实质与功能，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可贵见解。

综上所述，董仲舒所论及的尊崇儒学的教育政策，对于封建国家的文教建设的方向和发展及其促进国家的昌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也说明了国家教育管理工作的必要性及其重要地位。由此得到汉王朝的认可与推行，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开始了以儒学教育为国家官方的正统教育的局面。并以儒学

博士为教授之官，实行尊孔读经以养士化民，从而也就诱使士民趋于学儒而谋求为官与入仕。正因为如此，儒家的教育政策宗旨，贯彻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

可以说，董仲舒“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提出，阐发了儒学思想，促进了当时思想文化的统一与发展，对于当时社会起着“一统”与“安定”的作用，有其相当的历史意义；对于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发生深刻的影响。但也形成了封建主义的“一言堂”。表现排他性，所以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学术争鸣与发展，加强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其遗害是很深远的。在随着封建社会从上升发展而走向下坡路的过程中，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独尊儒术以维护和挽救其反动统治，其保守性与滞碍作用就日益显著。但是，就整体上看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当然，对于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糟粕是必须扬弃的。

## 二、“兴办太学”的养士之方

关于董仲舒的文教政策思想，如上所述，首先他申述了显示方针性的教育宗旨。与此同时，即提出具体的教育兴革设施问题，这主要是他倡行的“养士”与“选士”的设计。董仲舒认为，为要以儒术进行汉代的“更化”或“改制”来实现“德政”与“德教”，为要维护汉天子的集权与专制统一，这就需要拥有相当数量和相应思想才能的足以辅佐君主之臣。为此，他宣称：“吾人积众贤以自强……是以建治之术，贵得贤而同心”，<sup>③</sup>从而明告汉天子务要得同心的众贤而任之，乃是“国家之兴也”<sup>④</sup>的重大事项。在这里，董仲舒表达了他的人才观，即是培养维护封建制度的儒者贤才，但他指明了这种贤才必须是统一思想，共同奋斗的贤才。他提出的“众其贤而同其心”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值得参酌。

那么如何才能博取维护封建制度的“众贤”呢？

首先，他提出了“养士”的政策措施。他在对汉武帝的策问中，直指汉武帝虽然勤奋执政，希望“务以求贤”以行王道，然而未能得到贤才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不珍视和鼓励人才，特别是平时没有培养人才。他说：“务以求贤……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由此提出必须由国家有目的有计划地兴办培养人才的学校，主要和首先设置国立的中央高等学校“太学”，以培养高级人才，任为国家官吏。他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可得矣”。董仲舒阐明了设太学以养士的重大意义，指出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即在兴办学校，要求“立太学以教于国”，从而提出建立太学的基本计划，虽然还不完整，只有一个粗略计划，但表明了国家建设和管理太学的必要性；太学“养士”的目的任务及其培养人才的基本原则与方法等。这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是一大创见和贡献。汉代建立太学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官学自东周衰废以来，至汉代相当安定与统一的条件下，在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改制而充实人才的要求下得到了复兴与发展。从世界高等学校史上看，这比欧洲十二世纪初期最早在意大利建立的萨勒诺（Salerno）大学要早一千二百多年。由此可见，汉代大学的建立在中国和世界史上的意义。

董仲舒关于设置太学的建设与实施，贯彻着尊崇儒学的教育宗旨，使儒学成为国家的官学；儒学《五经》博士成为学官，成为大学的专职教师。博士传授儒经，使儒经成为国家学校的官定教科书，用以培养汉王朝所需要的封建治术人才，学儒成为入仕的正途。其他各学说则不被教育政策列入到教材的范畴，只能在个人或在民间私学中进行。修治其他各学之士，一般来说，其入仕的途径、机会与地位较之儒学则颇狭窄和受局限，难达到高官厚禄之位。这在教育中体现着儒学自先秦时

期作为百家争鸣中一家之言的私学发展为名赫一时的“显学”，继而由秦代重禁儒家之学，到了汉武帝时发展为独尊的官学。此中表明了儒学在汉代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同时充分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述的“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sup>⑥</sup>

董仲舒关于设太学以养士的主张，表现了重视教育的意向，这是应予肯定和赞许的。但是他倡行的只是儒学的封建教育，轻视以致排斥其他思想学说特别是自然知识技能，这就不能开展广泛的文化教育，不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更不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秦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废除学校的设置，禁止《诗》、《书》、百家语之学，只是强调人们知法守法，实行强压的愚民政策，那么董仲舒的教育主张与实施，则是开设儒学的一种学校，提倡习读儒学的一种书籍，培养儒学的一种人才，以及用儒学钳制人们的思想。这说明封建的学校绝不在增加人们的知识，发展思维与个性，而主要是培养忠诚驯服地维护其封建秩序的官僚。它不能培养出真正有远大理想、有意志的卓越人才，而是训练出一批具有浓厚封建意识作用，追求功名利禄和循规蹈矩的儒生、庸才与奴才。董仲舒所提倡的“设太学以教于国”为汉王朝开辟了培养封建主义的“贤臣官吏”的途径，扩大了汉王朝原来只靠不稳定的“选贤举能”的察举制度，以吏为师的学生制度来选拔人才和养成官吏的办法，而能够有组织有目的地培养封建主所要求的称心合意的人才。这是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代之所以能建设发展教育事业、兴学育才，首先在于当时的封建社会与朝廷提出了要求，有其必要性。第二就是政治经济上有了稳定和充裕的条件，这就有了可能性。再有就是当权者认识了教育的价值及人才的重要意义，用政治力量给予保证。这就使其必要和可能成为现实。在汉代建设教育与兴学育才上显示出可贵的历史经验，可以说这

是值得今天借鉴的。

### 三、“重视察举”的选士之法

董仲舒为了使汉王朝拥有强大的能行“德政”、“化民”的官僚队伍，建议设太学以养士，为之开辟和提供了可靠的人才来源。与设学密切相联系的，他还提出了行贡举以选士的办法。因为董仲舒深感当时吏治不良而发生许多弊政，指出“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既无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这是需要改革的。同时董仲舒还认为当时施行的“任子”、“论资”与任官年久后即升职的办法是不良的，是不问德才、不论成绩，毫无选贤举能意义的，它的危害必然是所任非其人和所用非其才而造成吏治的腐朽不良。为此，董仲舒提出，要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贤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这样为改革吏治与改革授官而行贡举以选士的办法，也就是与教育培养人才密切有关的选拔人才的办法。特别是董仲舒还提出“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样要求以德能标准而进行察举人才，实为一种有积极意义的卓见。当然，董仲舒所要求的德、能与人才只能是具有封建性的，那他所倡行的那种“德教之官”也就是要选任能为封建政权服务的合格官吏。

董仲舒重察举以选士的文教政策不仅促使汉王朝加强和开展了察举工作，还在于发掘、奖励社会上潜存的人才，同时也鼓舞着更多的人们自学成才以备国家的选用。他建议汉王朝要使人们明确向往与追求，“少而习之学，长则材诸位”，这样，政府也就更能广泛地征得人才。当然，这在实际上也就是汉王朝扩大封建官僚的来源，取得更多更好的封建统治人才，但是董仲舒提出的贡举是要求“择其吏民之贤者”，这表达出一定的

任人为贤，任人唯才的意义，反对当时的“任子”与“贤选”等封建腐朽制度，抨击贵族大官僚大地主独据官位的特权及其危害，董仲舒要求“吏民之贤者”与“天下之士”能够得选入官，适应于当时庶族地主即中、小地主的发展与需求。由此也就调整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力量。然而董仲舒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阶级的偏见与局限，表现在他所指的察举之人还包括一些中小地主以及一些出身贫寒的庶民百姓之家的人才，虽然这种人在汉王朝选拔人才中是少数，但起着很大的有利于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它表现为诱惑和迷蒙人民大众追求一官半职，以仕为荣，效命和拥戴封建制度。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抹煞了阶级性，掩盖了阶级统治实质。但它毕竟使中国选士制度向前推进了一步。

以上笔者逐个分析了董仲舒三大文教政策的背景、内容及意义，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封闭的、极其严密的体系，正是由于这样，才产生了如此大的历史作用。首先、崇儒与“养士”、“选士”构成了一种对立统一，从哲学角度上讲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由于儒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与调整，为统治者所必需，因此儒学成为“士”的必修课程，“养士”和“选士”都要以儒学为内容标准，儒学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精神工具。“养”与“选”则变成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物质手段，两者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成为密不可分的一对亲兄弟。这种结合犹如灵与肉的结合一样，极其富有弹性和韵味，使人民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统治者的统治，这也正是董仲舒教化人民的高明所在。与此相呼应，“养士”与“选士”也构成一对矛盾而存在，两者是董仲舒一并提出的、相并而行、互相补充、这种作法极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开发，因为设太学以养士，一时设学肯定需时较久和规模与数量有限，因而养士的额数不多以及培养的周期较长，此将不能及时